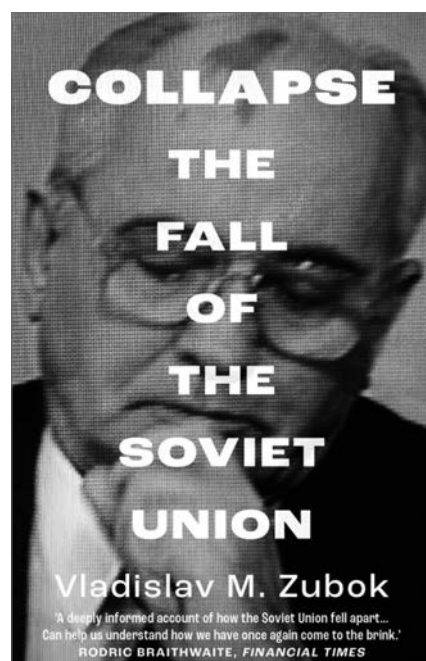


哀懷悲感總無名

——評 Vladislav M. Zubok, *Collaps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 田少穎

祖博克在新著《崩潰》中利用大量檔案材料和對親歷者的訪談，努力全景復現蘇聯改革失敗及國家解體過程，詳細刻畫各種力量和各色人物的複雜博弈。一仍其舊，他將其主要歸因、歸責於領導人個性與領導能力。



Vladislav M. Zubok, *Collaps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三十餘年以來，蘇聯共產黨末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 (Mikhail S. Gorbachev) 改革失敗和蘇聯解體的過程、原因引發學者不斷從不同角度和立場進行挖掘和解釋，如何看待和評價「戈爾巴喬夫現象」成為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的重大問題。英國學者布朗 (Archie Brown) 在 1996 年出版《戈爾巴喬夫因素》 (*The Gorbachev Factor*) 一書，剖析戈爾巴喬夫在改革和國家轉型中的貢獻及其在二十世紀後半葉世界史上的角色，代表了西方學者相關研究的基調^①。近年，不少學者也以不同形式參與探討 (下詳)，並對戈爾巴喬夫取同情式理解。

俄裔著名學者、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史教授祖博克 (Vladislav M. Zubok) 作為蘇聯解體親歷者，對蘇聯末期歷史做了持之以恆的探

* 感謝匿名審稿人、編輯部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陶然教授、胡琨副研究員提供的討論。本文文責自負。

索。自2002年以來，他發表了多項研究，探討戈爾巴喬夫對冷戰終結和蘇聯解體發揮了何種作用。在他看來，戈爾巴喬夫有盲目樂觀、天真輕信、優柔寡斷、粗枝大葉等缺點，又有賭徒性格，其施政使蘇聯在內政上逐漸陷於動盪，在外交上對西方作出過多讓步；領導人個性和施政方式是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②。

2021年，祖博克新著《崩潰：蘇聯之垮台》(*Collaps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以下簡稱《崩潰》，引用只註頁碼)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在這部費時三十年才完成思考和寫作的著作中，祖博克利用大量檔案材料和對親歷者的訪談，努力全景復現蘇聯改革失敗及國家解體過程，詳細刻畫各種力量和各色人物的複雜博弈。一仍其舊，他將其主要歸因、歸責於領導人個性與領導能力。他在書中再次回溯、剖析了自由民主、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在蘇聯、後蘇聯空間和當前世界上的左衝右突，就民粹主義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挑戰提出警告。

本書對世人已知的很多發人深省的場景提供了更豐富的細節，且框架宏大，試圖在「戈爾巴喬夫因素」之外，增加「西方因素」以勾連歷史與現實，對蘇聯改革失敗和國家解體原因提出整體性解釋。作者並希望藉本書提出一系列問題：戈爾巴喬夫為何在外交場合廣受歡迎，在內政上卻陷於失敗？1991年初蘇共內部真有要求戈爾巴喬夫建立獨裁管治的威脅存在嗎？戈爾巴喬夫提出的建立新聯盟計劃有成功

的可能性嗎？1991年立國的俄羅斯聯邦注定會走向威權主義，還是錯失了民主鞏固的機會？作者希望讀者在讀完本書後，對「催生了一個新世界的地緣政治和經濟鉅變有更深入的理解」(頁9-10)。書中對蘇聯解體過程中俄羅斯和烏克蘭博弈的描述，還可為世人理解當前俄烏戰爭提供背景知識。

然而，本書存在敘事論證不足和與其他學科對話不足等缺陷，可能導致結論偏至(partial)，已為學界同仁述及^③。正如米勒(Chris Miller)所說，在國際學界對蘇聯解體的研究中，存在根本上歸罪於戈爾巴喬夫的威權派敘事模式^④。不難看出，祖博克的新著已頗為接近這類觀點。因此，比較近年同類研究，從多學科角度評析祖博克觀點，增進對相關研究進展和爭論的了解，實屬必要。

一 主要內容

除去「導論」和「結論」，《崩潰》一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以「希望與傲慢」為題，第二部分以「衰落與崩潰」為題。

第一部分涵蓋第一至第六章。第一章「改革」開篇即以褒揚方式追述1980年代初安德羅波夫(Yuri V. Andropov)的保守改革方案，此後敘述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推行的反酗酒運動、加速戰略效果不佳；從1987年初開始，戈爾巴喬夫轉而推行激進經濟改革，結果卻損害了蘇聯的財政穩定性。第二章「放開」批評戈爾巴喬夫的外交改革，指出

本書試圖在「戈爾巴喬夫因素」之外，增加「西方因素」以勾連歷史與現實，對蘇聯改革失敗和國家解體原因提出整體性解釋。書中對蘇聯解體過程中俄羅斯和烏克蘭博弈的描述，還可為世人理解當前俄烏戰爭提供背景知識。

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開篇即確立了保守改革和激進改革的優劣對立，奠定了本書基調；其後描述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就經濟改革合作的計劃流產，更為詳細地揭示了蘇聯末期內訌之一斑。

他從未明確東歐前途問題，也無力處理國內族際衝突，其政改助推民族分離主義上揚。第三章「革命」聚焦於1989年這個動盪之年，戈爾巴喬夫推動的政治自由化造成政治極端極化，內亂頻生，蘇聯在東歐的外部帝國也開始崩解。第四章「分離主義」講述俄羅斯獨立運動的興起及各加盟共和國分離運動的強化。第五章「十字路口」討論1990年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Boris N. Yeltsin)圍繞經濟改革的權鬥。第六章「利維坦」分析蘇聯軍方、克格勃(KGB)和軍工集團等強力部門在危機狀態下的表現，探究它們是否曾逼迫戈爾巴喬夫建立獨裁管治。

在第一部分當中，最值得注意者是第一章開篇即確立了保守改革和激進改革的優劣對立，奠定了本書基調；而第五章描述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就經濟改革合作的計劃流產，更為詳細地揭示了蘇聯末期內訌之一斑。在如上基調下，作者在本部分講述了戈爾巴喬夫及屬下如何把保守改革轉變為革命性賭博，最終拆除了蘇聯黨和國家體系的支柱；反體制力量在受蘇共統治多年的壓制後，被戈爾巴喬夫不成功的改革所強化，並釋放到公共政治當中。

第二部分涵蓋第七至第十五章。第七章「僵持」闡釋1990年代初立陶宛危機的發展，導致八個加盟共和國反蘇共中央的局面。第八章「退化」講述在蘇聯開啟新聯盟條約談判的過程中，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雙頭政治」的形成。第九章「共識」述及蘇聯經濟學家和政客希

望推動美國對蘇聯執行新的「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式經濟援助的努力，以及幻想的破滅。第十章「密謀」縷述1991年由蘇共強硬派發動、以迫使戈爾巴喬夫放棄權力為目標的「八一九」政變的謀劃。第十一章「軍政府」記錄政變失敗後蘇共中央的瓦解。第十二章「滅亡」提到戈爾巴喬夫試圖組建新的蘇共中央臨時政府的努力及其失敗，最終時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全面奪權。第十三章「嘈雜」指出蘇聯解體前夕戈爾巴喬夫仍朝西方求援，俄烏雙方就烏克蘭獨立問題各自盤算。第十四章「獨立」延續前章，講述俄烏就烏克蘭獨立問題持續纏鬥。第十五章「清算」敘述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國宣布解散蘇聯並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CIS)的過程。

本書第二部分為讀者提供了蘇聯解體前很多新的細節，如戈爾巴喬夫如何在「八一九」政變後試圖重建蘇共中央；葉利欽如何促成烏克蘭獨立，好讓後者承擔搞垮蘇聯的責任；美國如何管控蘇聯解體過程，從希望立陶宛暫緩獨立和不支持烏克蘭獨立，轉而要求戈爾巴喬夫允許波羅的海三國獨立，並在國內烏克蘭裔、東歐裔選民壓力下轉而支持烏克蘭獨立，等等。其中，蘇聯經濟學家和政客與美國接洽，希望其提供金錢援助、幫助蘇聯緩解經濟改革代價的場景，比陶布曼(William Taubman)所著《戈爾巴喬夫傳》(*Gorbachev: His Life and Times*)的論述更為詳細^⑥，是祖博克將改革失敗和國家解體歸因、歸責於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並抱怨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坐視蘇聯走向崩潰的論據(頁229-45)。這部分的討論與書中第一部分對戈爾巴喬夫不懂經濟、耽誤經濟改革時機的批判對接，體現了作者創立其敘事模式、探尋整體性解釋的努力，這一努力又是為其「蘇聯並非注定解體」的主旨服務的。

二 主旨和研究思路

在本書「致謝」部分，祖博克交代了寫作的緣起和主旨：受蘇聯社會和政治研究專家扎斯拉夫斯基(Viktor Zaslavsky)的鼓勵投入這項研究，但得到了與其相反的結論，即蘇聯並非「注定失敗」(doomed, 頁xvi)。

在「導論」中，祖博克直指蘇聯解體仍是待解之謎(頁3-10)：他等待了多年，在西方流行的還是「蘇聯注定解體論」。他列舉這些年來的各派觀點，比如，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在2005年說「蘇聯解體是上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後，遭到西方譏諷，西方此時還抱持自由主義勝利論，並在推動北約(NATO)東擴；然而，在2008年俄格戰爭及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半島後，西方又轉而抨擊俄羅斯要恢復「失去的帝國」(頁2-3)。在中東歐國家中，有些領導人稱對中東歐、格魯吉亞和烏克蘭來說，「蘇聯解體是幸事(blessing)」，但僅有少部分西方人還記得俄羅斯在蘇聯解體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頁5-6)。在俄羅斯內部，自由派相信蘇聯無法實行改革；懷

舊者懷念蘇聯的偉大，稱斯大林是偉人，而戈爾巴喬夫把蘇聯出賣給西方。學者的觀點則可以分為幾類：第一，美國的優勢和冷戰政策使蘇聯退縮並投降；第二，戈爾巴喬夫在開放政策(Glasnost)中提倡的公開性和透明性使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蘇聯體制名譽掃地，進而失敗；第三，蘇聯敗亡於其經濟爆炸；第四，民族獨立運動導致「最後的帝國」內爆；第五，最有實力的蘇聯精英反對改革，導致蘇聯滅亡。祖博克稱自己不同意這些觀點，他認為各種因素交織而成的風暴被戈爾巴喬夫的統治釋放出來，才是蘇聯滅亡的原因。

祖博克指出，經過三十年思考後，他認為蘇聯「中央經濟和戈爾巴喬夫的『社會主義選擇』注定會失敗，但我不再覺得蘇共的滅亡有同樣的必然感」(頁8)。為重新思考「蘇聯注定解體論」，祖博克從多方面擴大歷史視域。

首先，他指出對蘇聯解體的多種分析路徑相互重疊，才給人帶來了注定解體的印象，歷史結果也確實如此。然而，他提出蘇聯解體進程中有諸多偶然性，如社會運動和意識形態潮流之非理性、政治意志會把歷史推向出人意料的方向、某些意外會帶來重大後果等。對史家來說，蘇聯解體雖仍舊是待解之謎，但謎題中心戈爾巴喬夫的個性和領導能力使關於蘇聯解體的各種解釋得以黏合起來。很多同情戈爾巴喬夫的學者喜歡標舉其外交政策，將其施政失誤歸因於其他內政因素和其政敵的掣肘，祖博克稱對此要作更冷靜的分析。

蘇聯解體雖仍舊是待解之謎，但戈爾巴喬夫的個性和領導能力使關於蘇聯解體的各種解釋得以黏合起來。很多同情戈爾巴喬夫的學者將其施政失誤歸因於其他內政因素和其政敵的掣肘，祖博克稱對此要作更冷靜的分析。

祖博克提出了其核心觀點：蘇聯解體雖然與政治和經濟危機加重有密切關係，但蘇聯體制本來未必會垮台，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方案及其推行方式導致了崩潰。

其次，他要擴大歷史角色分析的範圍。他寫道，蘇聯實力一貫被誇大，但即便到了1990年，蘇聯內外的觀察家也沒有人認為蘇聯注定垮台。戈爾巴喬夫及其批評者都承認，沒有「八一九」政變，蘇聯不會崩潰得那麼快、那麼徹底。祖博克認為蘇聯解體是「人類理想、恐懼、熱情和出乎意料的進展的戲劇」：戈爾巴喬夫等蘇聯領導人當時就改革辯論，對族際衝突和加盟共和國分離運動如何處置，承擔着巨大壓力；他們為此激烈推脫責任，又相互爭奪權力，「自發反應、謠言、恐懼、一時的樂觀情緒和更頻繁發作的絕望充斥於過程中」，這才是真正的歷史，是一齣超越了「希臘合唱」(Greek chorus)的「純粹蘇聯悲劇」(頁7)。戲中的角色不僅僅有戈爾巴喬夫及其對手葉利欽，還包括蘇聯末期黨內頑固派、改革派、經濟學家、外交官、議會代表、克格勃軍官、軍人、軍工集團代表、新興企業家、記者、民族分離運動者，等等。

再次，祖博克細緻討論了「西方因素」尤其是美國因素在蘇聯解體過程中的作用。他指出在1990至1991年，美國對蘇聯的軟實力堪比1947年對歐洲提出馬歇爾計劃之時。當時的實際情形和時下流行的美國搞垮蘇聯的陰謀論大為不同，許多蘇聯人歡迎並邀請美國人幫助蘇聯經濟轉軌，然而，美國領導層在行使其軟實力上缺乏想像力，過於謹慎。

最後，令祖博克驚奇的是，當時許多人看清了危機的部分線索，但沒料到整個國家會垮掉，可見

「即使是廣為人知的證據，從遠處看也會有所不同」；事態發展之快使很多人日後強烈地改變了看法，這是革命性時刻的標誌。他舉其本人經歷為例：當年他對戈爾巴喬夫的「新列寧主義」(Neo-Leninism，即推動政治民主化以打擊官僚主義，頁27)論調嗤之以鼻，現在才明白這是後者真正的信仰；當年他認同反共意識形態和美式自由主義，尤其是其經濟學說，「這看起來很『自然』，是『回歸常識』」，現在則認為那是導致俄羅斯建立初期經濟災難的原因；當年他對貨幣在蘇聯解體中的功能完全不懂，徹底錯過認知機會。他認為：「這並不是用事後孔明式的智慧來批評歷史諸角色，而是要將他們的動機和熱情歷史化。」(頁9)

祖博克對蘇聯改革失敗和國家解體的研究和既往戈爾巴喬夫傳記類研究有很多共同點，但他在導論中繞過了這些研究，直接否定上述五類結構性分析，主張要擴大視域，提出整體性解釋。他的新說是否成功，要通過觀察其主要觀點、推敲其論證方式來確定。

三 主要觀點

以上述研究思路為基礎，祖博克在書中提出了其核心觀點：蘇聯解體雖然與政治和經濟危機加重有密切關係，但蘇聯體制本來未必會垮台，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方案及其推行方式導致了崩潰。

第一，祖博克指出，蘇聯軍工佔國民經濟比例從未超過15%，經

濟並非被軍費負擔壓垮(頁17)。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推動反酗酒運動和加速戰略，加重了經濟危機。此後，他從1987年初開始轉向激進經濟改革，又有重大疏失：《社會主義企業法》(*Law on Socialist Enterprises*)未經試點即全面推開，使企業中的黨治體系動搖，企業經理和工會主席利用新局面吞沒利潤，不為民眾的需要安排生產。蘇聯還進行了破壞財政穩定性的銀行業改革，允許合作社和國有企業創立商業銀行：合作社按國家定價從國企買入產品，然後加價賣給國內外市場；國企則利用與合作社的交易將內部使用的記賬盧布(*bezna*)轉為外部使用的現金盧布(*na*)。這導致兩種貨幣之間存在多年的藩籬被打破，現金盧布如潮水般增長，幾年後通脹即不可收拾。然而，戈爾巴喬夫一直不敢進行價格改革以治理通脹問題(頁27-33)。

第二，在戈爾巴喬夫對經濟改革及其產生的後果感到失望後，又轉向激進政治改革，最終導致反體制力量大爆發和蘇聯解體。在祖博克看來，戈爾巴喬夫把全部權力重歸作為立法機關的蘇維埃是大錯特錯的，因為蘇維埃無力既管立法，又管行政。在國家向多黨制和蘇維埃向競爭性選舉制的轉型中，他也輕視了民粹主義的力量，改革派領導人均無選舉經驗，在選戰中鬥不過民粹派。最重要的是政改為葉利欽所利用，後者操弄民主化和總統制話題來吸引選票，以便個人在政治上翻盤。戈爾巴喬夫將蘇共中央大權轉移給最高蘇維埃，使蘇共失去了掌控政權的能力，導致改革進

程失控。「潘朵拉魔盒」打開後，經濟上持續混亂，政治上民粹主義、民族主義都被釋放出來，蘇聯開始進入解體進程(頁33-42)。

第三，在蘇聯改革失敗和國家解體進程中，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的纏鬥是影響局勢走向的關鍵。1990年夏季，葉利欽當選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開始挑戰戈爾巴喬夫及蘇共中央，其手段是假合作、真爭權。7月，蘇聯經濟學家亞夫林斯基(*Grigory A. Yavlinsky*)提出過渡到市場經濟的經濟改革計劃，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先後表示興趣，要合作推動改革。戈爾巴喬夫希望以此換取各加盟共和國締結新聯盟條約，葉利欽則宣揚由此為俄羅斯百姓謀取更好生活，為俄羅斯贏得更多主權。不久，葉利欽對戈爾巴喬夫明確提出去除蘇共中央政府的意圖，稱俄羅斯要接手蘇聯大部分財產與資源；兩人的明爭暗鬥使經濟改革計劃從未付諸實施，政爭滲透着回應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的考量，改革時機則因此流逝(頁131-40)。

與此同時，蘇聯不少加盟共和國的獨立運動風起雲湧，蘇共強硬派逼迫戈爾巴喬夫建立獨裁管治以保住蘇聯。立陶宛民選領導人看到蘇聯可能垮掉，要讓本國獨立運動成為蘇聯垮台導火索。1991年1月，蘇共中央出兵，在立陶宛和拉脫維亞製造了流血事件。葉利欽趕往波羅的海三國，並和當地分離主義組織一起譴責蘇共中央。立陶宛危機的發展使葉利欽推動俄羅斯獨立轉而成為政治正確，還使美國開始介入蘇聯內政(頁181-87)。

在蘇聯改革失敗和國家解體進程中，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的纏鬥是影響局勢走向的關鍵。兩人的明爭暗鬥使經濟改革計劃從未付諸實施，政爭滲透着回應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的考量，改革時機因此流逝。

祖博克提出戈爾巴喬夫對蘇聯解體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他的改革思想和政策設計致命性地過時，破壞了既有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他想讓自己成為新的列寧，完成大幅度的多方面改革，而未曾吸取俄羅斯歷史上改革的經驗教訓。

第四，西方趁蘇聯內外交困掠取戰略利益。美國人在兩德統一和立陶宛危機問題上都希望蘇聯作出讓步，為此，美國和西德確定了幫助戈爾巴喬夫維護國內地位，又迫使蘇聯不對立陶宛動武的方針。西德為謀求國家統一，對蘇聯解囊，美國則口惠而實不至。在這裏，祖博克超越了許多學者主張的美國曾在兩德統一談判過程中對蘇聯承諾北約不東擴的說法，進一步提出如下觀點：1990年2至6月，美國還一直許諾給蘇聯提供經濟援助，換取後者接受美國對其內政的干預，並作出諸多外交讓步。然而到6月，美方改口說無法對蘇聯提供200億美元援助。7月，戈爾巴喬夫突然會見西德總理科爾(Helmut Kohl)，寄希望於德國人幫助把蘇聯拉入歐洲，為此對西德作出重大讓步。祖博克譏諷這是「閃電戰外交」(Blitz-diplomacy，頁124)，而在屢次向多方讓步後，蘇聯仍無法取得符合預期的外交成果(頁109-25)。

在經濟危機困局下，亞夫林斯基、蓋達爾(Yegor T. Gaidar)等蘇聯經濟學家認同「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要在蘇聯快速推動私有化、市場化，讓人民承受「野蠻衝擊」(brutal shock，即「休克療法」，頁230)，從而改變惰性。他們和美國學者合作，希望勸說美國對蘇聯執行新的馬歇爾計劃。然而，戈爾巴喬夫支持的亞夫林斯基和反對激進經濟改革的蘇聯總理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他後來參與了「八一九」政變)各自派出人馬接觸美方，使後者生疑，

導致求援計劃泡湯(頁229-45)。「八一九」政變之後，葉利欽在顧問布爾布利斯(Gennady E. Burbulis)力勸之下，終於接受了蓋達爾提出的「休克療法」式市場化方案(頁353-59)。

在蘇聯改革失敗和國家解體過程中，戈爾巴喬夫為保住蘇聯，葉利欽為奪權，各加盟共和國為實現國家獨立，都爭相尋求美國支持。美國的政策也經歷了一個曲折轉變的歷程：從幫助戈爾巴喬夫維繫蘇聯以獲取讓步，到對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執行平行外交政策，以管控蘇聯解體進程；再到與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打交道以確保蘇聯核武器不因解體進程失控，逐步滑向承認各國獨立(頁359-64)。

在本書「結論」部分，祖博克提出，戈爾巴喬夫的性格、領導能力和信仰是蘇聯自毀的主要因素，他對蘇聯解體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他的改革思想和政策設計致命性地過時，破壞了既有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他想讓自己成為新的列寧，完成大幅度的多方面改革，而未曾吸取俄羅斯歷史上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維特(Sergey Y. Vitte)、斯托雷平(Pyotr A. Stolypin)改革的經驗教訓，結果在歷史上起到破壞者的作用。他在犯錯後未能改正，未能採用能帶來成功的策略。他提倡的「人道社會主義社會的彌賽亞式理想」(messianic idea of a humane socialist society，頁427)，脫離蘇聯政治和經濟現實，無法推動真正的改革。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共中央趨於軟弱，不敢動用武力反擊地方分離主義，卻幻想藉改革

使蘇聯重返歐洲，加入西方陣營。他眼望西方援助，而美國選擇的是波羅的海三國和中東歐各國。

祖博克假設改革的替代性道路即安德羅波夫式保守改革得以實行，通過推行新經濟政策，或可得到人民支持；戈爾巴喬夫如果引導精英不自外於改革，推行國家資本主義和私有化，蘇聯可能有機會進入世界經濟，並保住政權和聯盟國家。祖博克還指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釋放出民粹主義、反共主義和民族主義各種力量，且又不是其對手。西方不肯幫助蘇聯和俄羅斯民主化，將其扔給民粹主義力量。俄羅斯民粹派本來幻想一旦搞垮蘇聯，實行民主制度，就可以很快融入西方。但在願望沒有達成後，他們產生被西方欺騙之感，這導致俄羅斯在北約東擴問題上和西方長期鬥爭。

祖博克最後奉勸世人，不要把蘇聯解體淹沒在冷戰終結、去殖民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全球化等敘事中，而要從中吸收經驗教訓：誰也想不到蘇聯解體三十年來中國因得到大量海外投資而崛起，東歐各國、波羅的海三國也得到投資而有所發展，只有俄羅斯和烏克蘭一直在相互競爭下緩慢發展。西方國家早早判定後蘇聯空間龐大、落後、混亂，因而撒手不管，結果現在動搖整個自由主義秩序的正是俄烏戰爭。祖博克還認為，俄羅斯人經歷了共產主義的崩潰和資本主義的失敗，對自由主義秩序心懷疑慮有其道理。目前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不只在俄羅斯、烏克蘭作祟，在美國和東歐都已出現，自由主義秩

序受到極大衝擊，因而，冷戰後的歷史並不是民主自由的勝利史。

四 對本書的評價

祖博克在本書中試圖超越僅選取經濟和政治改革、民族分離運動等單一方面進行考察的路徑，匯集蘇聯改革和解體過程各個側面，以戈爾巴喬夫的個性和施政為聚焦點進行分析，試圖提出既多元又有側重點、縱貫蘇聯解體直至當前國際態勢的整體性解釋，並透過自由民主、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透鏡，對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人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歷史責任重新審視。本書細節豐富，敘述繁複，但存在方法論證不足、和其他學科對話不足等缺陷，導致其主旨引人爭論。

首先，本書的研究方法和敘事論證不足，核心概念仍待推敲。祖博克否定了軍費負擔壓垮蘇聯、民族分離運動搞垮蘇聯等單因論解釋，試圖擴大角色分析的範圍並展示歷史過程的偶然之處、行動的意外結果。其結論最終還是落腳在戈爾巴喬夫的人格特點、其登場及施政對歷史進程的偶然影響上，以至構建出一個反事實敘事，稱蘇聯本可借助安德羅波夫式保守改革得以維繫，甚至經濟得到改善。這種緊緊圍繞領導人因素展開分析的方法論可謂是人格理論和偶然性分析的結合^⑥。然而，這導致祖博克的研究具有「以成敗論英雄」的色彩，成為另一種單因論，導致在綜合各因素提出結論時遇到困難，在勾連歷史和現實時容易出現邏輯跳躍。

祖博克認為，不要把蘇聯解體淹沒在冷戰終結、去殖民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全球化等敘事中，而要從中吸收經驗教訓：誰也想不到蘇聯解體三十年來中國因得到大量海外投資而崛起，只有俄羅斯和烏克蘭一直在相互競爭下緩慢發展。

祖博克僅從個性和領導能力出發批判戈爾巴喬夫，而未系統回顧和解釋戈爾巴喬夫等蘇聯領導人的出現這一歷史現象及其根源。事實上，轉型國家的精英各有其成長背景和思想來源，其政策選擇也受到各國自身條件限制。

實際上，陶布曼便坦承戈爾巴喬夫的個性是個謎，通過其個性解釋歷史存在不少困難^⑦。僅從個性出發進行研究，就可以達致差異很大的結論，如科特金(Stephen Kotkin)即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性格不合，「俄羅斯總統太居心叵測，蘇聯總統太貪慕虛榮，兩人無法相互擁抱並拯救某種形式的聯邦」，結果雖毀了蘇聯，但「他們的互補作用卻幫助一個危險的、裝備精良的警察國家和平解體」^⑧。

祖博克僅從個性和領導能力出發批判戈爾巴喬夫，而未系統回顧和解釋戈爾巴喬夫等蘇聯領導人的出現這一歷史現象及其根源。事實上，轉型國家的精英各有其成長背景和思想來源，其政策選擇也受到各國自身條件限制。正如英格力什(Robert D. English)所說，戈爾巴喬夫代表的是蘇聯1960至70年代成長起來的整整一代西化派知識份子。這些人成長於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的解凍時期，秉持十九世紀的人道社會主義思想，期望通過改造蘇聯外交和內政，突破世界劃分為兩個對抗部分的現狀^⑨。

祖博克指責戈爾巴喬夫不敢進行價格改革，稱其和葉利欽的權力鬥爭也耽誤了價格改革時機。實際上，巴特爾(Fritz Bartel)指出，由於意識形態束縛和歷史包袱，共產主義國家推動的經濟改革要獲得社會信任，往往需要承擔較大成本和風險，而且內部阻力較大；民選政府進行價格改革，尤其在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加持下則較為順利。例如，波蘭民眾和團結工會(Solidarity)基於對政府改革方案的疑慮，在

1970至80年代曾四次抗拒政府施行緊縮措施，所以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一直推遲改革；在實現政府民選後，波蘭民眾才在1990年代初接受了價格改革。俄羅斯民眾在1992年接受價格改革，也是如此^⑩。這樣看來，祖博克對戈爾巴喬夫經濟改革的批評就值得進一步探討。

祖博克稱戈爾巴喬夫認同列寧的理想主義，但在上台後卻提不出清晰的改革戰略，手法上也是仿效列寧，從而拋棄了安德羅波夫式受控的保守改革路線。這與布朗指出的蘇聯經濟改革的難度及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初在經濟事務上的有限權力、面對極大阻力的實情相抵牾^⑪。

祖博克在本書中指出，葉利欽最終奪權勝利是因為操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還批評西方不肯幫助蘇聯以至俄羅斯民主化。祖博克對民粹主義在當年的蘇聯和現在西方的影響進行概括性的類比，脫離了各國民粹主義力量抬頭的不同具體情形。社會學家塞勒尼(Iván Szelényi)、米哈伊(Péter Mihályi)近年指出普京並非民粹主義者，他只是會選擇一些政策迎合左翼，因為這有利於其擊敗民主派，維持「不自由的民主」；特朗普(Donald J. Trump)模仿普京進行集權，但受到美國三權分立體制的限制，難以走得太遠^⑫。祖博克設置的敘事邏輯，即民粹主義在1980、90年代於蘇聯、俄羅斯抬頭，直至近年衝擊國際秩序，對西方雖然具有警示性，但如何吸取教訓，有待細緻分析。

其次，本書未延續此前祖博克探討的中蘇、中俄改革比較^⑬，只略提了中國與蘇聯經濟改革結果不同，「中國經濟進程很少引起蘇聯媒體關注」（頁229），改革者在蘇聯末期更重視效法西方。祖博克在「結論」部分明確認為中國改革明顯更成功，中國不僅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還有可能超越美國；這引發美國學者探討中美在全球的實力對比上開始利於中國，中美競爭「不可避免」，等等（頁438）。儘管本書對中蘇改革比較着墨不多，但祖博克在之前的研究中提出了兩個根本問題：第一，蘇聯能否通過保守改革或學習中國改革道路取得一定成效，從而保住蘇共政權和蘇聯國家；第二，中國改革是否真正取得了成功。就第一個問題而言，戈爾巴喬夫確曾效仿過中國經濟改革，但因既得利益集團阻礙而難以推行。祖博克的立場和曼（Michael Mann）的觀點類似，認為中國改革更為成功，戈爾巴喬夫未能正視中國經驗和辦法，又只能破舊不能立新，使本有機會完成改革的蘇聯終歸失敗，「戈爾巴喬夫被證明是一位理論家，而鄧小平則是務實的」^⑭。韋伯（Isabella M. Weber）近年研究了中國改革精英經濟學理解的形成及政策爭論、抉擇過程，指出他們的農村經歷、對農村改革的投入及其成功，使中國得以從農村這個邊緣地區推進經濟市場化，而當時深受西方經濟學影響的蘇聯精英無意也無法模仿這一模式^⑮。因而，第一個問題被蘇聯經濟史研究消解。

就第二個問題而言，塞勒尼、米哈伊提出，匈牙利和中國等紛紛

效仿普京體制：從舊寡頭——享有較為安全的財產權的「承襲制」（patrimonialism），轉向新寡頭——不再享有干政權和財產權的「俸祿制」（prebendalism）。普京建立的是受控的、有「不自由的民主」的俸祿制國家，它能夠靠不斷反腐和經濟增長維繫來贏得民眾支持；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中俄體制日趨接近，且都面臨巨大挑戰^⑯。可見第二個問題的答案也不確定。

再次，作為歷史學專著，本書和其他學科對話不足。事實上，經濟學家早已就蘇聯制度本質及前途做出過分析。如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提出，蘇聯類型的「汲取制社會」可以實現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但不能持久，因為既得利益集團會阻礙改革者打破汲取性制度，經濟停滯後精英階層的內訌還會使國家和社會崩潰^⑰。祖博克2013年對社會學家將普京治下的俄羅斯概括為帶有「新封建」特徵的承襲制、「新承襲制」、「譜系上沿襲蘇聯時代的『專制結構』」都表示不同意，但他未有進一步探討，更注重俄羅斯秉持西方新自由主義信條進行轉型帶來的慘痛經歷的衝擊^⑱。在本書中，祖博克未與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對蘇聯改革失敗和國家解體的大量研究進行對話，檢查本書六十多頁註釋，未發現他引用類似研究。

最後，由於祖博克以戈爾巴喬夫等蘇聯領導人的個性與施政為敘事中心，本書還缺乏對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在後蘇聯空間中的長期影

祖博克以戈爾巴喬夫等蘇聯領導人的個性與施政為敘事中心，缺乏對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在後蘇聯空間中的長期影響的關注，使其在思考戈爾巴喬夫的歷史遺產問題上前瞻性不足。他雖提到近年俄羅斯與西方的糾紛，但未闡釋其背後的思想動因。

祖博克回溯民粹主義在蘇聯和後蘇聯空間的演變，並聯繫當前形勢，以此否定戈爾巴喬夫的激進改革。戈爾巴喬夫推動的公開性確實帶有民粹主義氣質。然而，他使東歐和蘇聯以至世界實現了和平轉型。

響的關注，使其在思考戈爾巴喬夫的歷史遺產問題上前瞻性不足。他雖提到近年俄羅斯與西方的糾紛，但未闡釋其背後的思想動因。近期米勒探討了普京治下的克里姆林宮反對普世價值的原因及目的：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讓當下的俄羅斯統治者反對一切會帶來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劇變的普世主義因素，他們因而在歐盟壓力下，仍力圖論證後蘇聯空間在體制上與歐盟相異的合理性，宣稱深刻的文化和文明因素使西方民主在該空間無法實現^①。不難看出，俄羅斯當前執政勢力繼承了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改革未能消解的社會力量，祖博克在書中對其關注似有不足。

五 小結

總體而言，祖博克《崩潰》一書視野宏闊，布局精密，細節具有可讀性，但並未在解釋上實現突破；在今年9月「美國人文與社會科學在線外交史和國際關係專欄」(H-Diplo)舉行的圓桌書評討論會上，他本人也承認了這一點^②。這可能和他是蘇聯解體親歷者，對民眾的慘痛經歷感同身受，從而簡化了因果分析有關。

比較各國轉型經歷，並參考南斯拉夫、朝鮮、土庫曼斯坦等國的歷史和現狀，不難看出，即使祖博克認為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推進的激進轉型方式有很多問題，也難以證明其是最壞選項，而保守改革是最優選項。前述巴特爾和韋伯的研究也表明，蘇聯、中國和波蘭等國領

導人在價格改革問題上都曾猶豫不決、政策反覆不定，使社會和領導人自身都付出代價。

在當今世界，民粹主義在多個國家大行其道。祖博克回溯民粹主義在蘇聯和後蘇聯空間的演變，並聯繫當前形勢，以此否定戈爾巴喬夫的激進改革。戈爾巴喬夫推動的公開性確實帶有民粹主義氣質。然而，正如布朗所主張的，戈爾巴喬夫面對巨大阻力和風險，使東歐和蘇聯以至世界實現了和平轉型^③。相比葉利欽，尤其是如今各國領導人推動民粹主義帶來的動盪、血腥，都大為不同。

總之，蘇聯—俄羅斯歷史極為複雜，史家對其進行解析，既需努力利用原始材料復現當年情境，也需充分結合各學科研究，對視角和邏輯反覆進行推敲，切實把一國歷史放進國際背景中進行深入分析，避免做出簡單化結論，更應避免過多寄託個人的衷懷悲感。

註釋

①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Vladislav M. Zubok, "Gorbachev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and Personality", *Cold War History* 2, no. 2 (2002): 61-100;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300-36; "With His Back against the Wall: Gorbachev, Soviet Demise, and German Reunification", *Cold*

War History 14, no. 4 (2014): 619-45.

③⑳ “H-Diplo | RJISSF Roundtable on Zubok *Collapse*” (11 September 2023), <https://issforum.org/roundtables/h-diplorjissf-roundtable-on-zubok-collapse>.

④ Chris Miller, *The Struggle to Save the Soviet Economy: Mikhail Gorbachev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6), 5-9.

⑤ William Taubman, *Gorbachev: His Life and Times* (London: Simon & Schuster Ltd., 2017).

⑥ 塔克(Robert C. Tucker)著，朱滄譯：《作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一項歷史與人格的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頁6-9。

⑦ William Taubman, *Gorbachev*, 28-29.

⑧ Stephen Kotkin, *Armageddon Averted: The Soviet Collapse, 1970-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11-12.

⑨ Robert D. English, *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Gorbachev, Intellectual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225-28.

⑩ Fritz Bartel, *The Triumph of Broken Promises: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75-77, 189, 343-44.

⑪⑫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139-40; 309-15.

⑬⑭ Iván Szelényi and Péter Mihályi, *Varieties of Post-communist Capital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ussia, Eastern Europe and China* (London: Brill, 2020), 188-89, 214-15; 17, 164-76, 193, 198-214.

⑮ 祖博克引入中蘇、中俄改革比較研究，構建起戈爾巴喬夫未能學習中國道路，導致蘇聯改革失敗的敘事模式。參見Vladislav Zubok, “Russia and the West: Twenty Difficult Yea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and Old Dimensions*, ed. Geir Lundesta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09-28;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in the 1980s: Reconciliation and Divorce”, *Cold War History* 17, no. 2 (2017): 121-41.

⑯ Vladislav Zubok,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in the 1980s”, 121-41; 曼(Michael Mann)著，郭忠華、徐法寅、蔣文芳譯：《社會權力的來源》，第四卷，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頁229-309。

⑰ Isabella M. Weber, *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 The Market Reform Debate* (London: Routledge, 2021), 4-7.

⑱ 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著，李增剛譯：《國家為甚麼會失敗》(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頁90-95、102、320-23。

⑲ Vladislav Zubok, “Russia and the West”, 217-18.

⑳ Chris Miller, “Russia’s Rejection of Liberal Politics: Marxist Critique of Trotsky and Fukuyama”, in *Before and After the Fall: World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ed. Nuno P. Monteiro and Fritz Bart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151-68.